



改革开放以来小说视域中的 城乡问题研究 (1978-2012)

詹玲
◎
著

A STUDY ON URBAN AND RURAL ISSUES IN NOVEL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N CHINA (1978-20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来小说视域中的 城乡问题研究（1978-2012）



詹玲◎著

A STUDY ON URBAN AND RURAL ISSUES IN NOVEL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N CHINA (1978-20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小说视域中的城乡问题研究(1978—2012)/詹玲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161-4170-0

I. ①改… II. ①詹…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②城乡建设—
研究—中国—1978~2012 IV. ①I207.42②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348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熊 瑞
责任校对 王兰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08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CZW015“新时期文学视域中的城乡问题研究”成果。
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项目资助成果。

目 录

谨以此书献给我那深受过城乡迁徙
之苦的父母双亲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现代性与城乡小说的考察视角	(2)
第二节 历史溯源:新中国前 30 年的城乡小说	(7)
第三节 写作思路与框架	(16)

上 编

第一章 徘徊与抉择:路遥笔下的城乡书写	(29)
第一节 向城还是向乡:选择的困惑	
——以《人生》为个案	(29)
第二节 人情关系:现代人格建构中的矛盾隐忧	
——以《平凡的世界》为个案	(41)
第二章 农民与知识分子:贾平凹城乡创作中的角色、情感冲突 ...	(58)
第一节 20 世纪 80 年代的城乡写作:农民本位与知识分子	
价值观的初次碰撞	(58)
第二节 从城市回望农村:从农民本位向知识分子本位的	
转变之道	(71)
第三章 追寻与坚守:张炜、王安忆城乡创作中的劳动价值观 ...	(89)
第一节 张炜早期的城乡书写:为保卫改革而展开的	

价值追寻	(89)
第二节 重寻革命起点的劳动价值观重建:以《你在高原》 为个案	(97)
第三节 劳动者的日常生活美学:王安忆城乡小说中的 市民精神	(106)
第四章 城乡抗争与人性恶变:陈应松、刘庆邦笔下的 城乡书写	(118)
第一节 陈应松:两难处境下的乡村人性之恶	(118)
第二节 刘庆邦:恶性抗争下的乡村苦难之悲	(134)
 下 编 	
第五章 现代性思考的转型与“进城乡下人”形象的变迁	(151)
第一节 “新启蒙”运动下的“阿 Q”热:从陈奂生的 被误读说起	(151)
第二节 现代性反思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158)
第三节 新世纪以来走向多元的“进城乡下人”形象	(165)
第六章 从自在生长到多种力量收编:打工作家与打工 小说的成长史	(177)
第一节 从自我情感抒发到意识形态干预:20 世纪 90 年代打工小说的成长	(178)
第二节 打工小说的商业收编及新变:以周崇贤作品为个案	(189)
第七章 从一元到多元:城市化进程中的女性形象书写	(203)
第一节 从“净化”到“欲化”:现代性思考转型与进城乡下 女性形象的嬗变	(203)

第二节 人情温暖与符号化书写:乡村女性形象的新变

与城市女性形象的缺失 (218)

参考文献 (226)

后记 (235)

绪 论

什么是城？什么是乡？面对关于这两个概念的诘问，我们常常有些无措。事实上，“城”与“乡”从来不是界定清晰的两个概念，因为它覆盖了太多学科：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哲学、历史学等等，不同学科领域都有出于各自学科特点的对城乡的不同理解和考察方向。比如，经济学以经济市场为基点分析城乡，社会学从拥有超越家族之上的“社会联系”以及合理的法律体系考察城乡差别；地理学则是交通环境、人群、房屋的密集度等方面区别城乡。学科的不同决定了城乡概念的不同，也就发展出相异的城乡理论。那么，怎样考察文学中的城乡？这涉及文学学科的根本。高尔基把文学叫做“人学”的建议，简单却深刻地阐明了文学与人的密切关系。从这一文学的根性出发，我们对文学中的城乡界限设立一个出发点：从社会变迁中人的生存状态进行界定。由此，在众多城乡概念的界定中，我们选择了费孝通的划分方式，即把可以孤立存在的，经济上能够充分自给的农业区域称为乡，或者乡村；把政治中心称为城，那些由商业基础长成的社区则称为市，或镇。尽管城与市镇之间有着政治和商业中心的差别，但事实上在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这种差别几乎被忽略不计，费孝通自己也说，“在很多事例中，城镇可能是合一的”。有鉴于此，我们把城、市、镇这三者通称为城，以示与乡、村的区分。

第一节 现代性与城乡小说的考察视角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城乡差别主要表现在政治权力和生产消费形态上。城市作为行政权力中心和商业消费中心,其繁华热闹景象与乡下的单调耕织生活形成一层对比,而农耕经济的稳定封闭与城市商业竞争及政权交替下人的命运的忧患莫测又形成另一层对比。这两层对比使城与乡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呈现出一种平等互补的关系:城里人的娱乐享受让乡下人艳羡神往,乡下人的自得宁静又牵动着城里人的归隐之心。科举考试使“耕读世家”成为可能,在文化主义天下观的意识之下,在城还是在乡,对人的命运发展并没有太多影响。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从国族层面和时间观念上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城乡概念。以1896年《说群·序》为起点,梁启超从延续康有为、严复“保种、合群”思路,到破天荒地使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①再到提出“中国民族”,并继而到“中华民族”,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彻底否定了原有的文化主义天下观,在中国社会民众之中建构起坚固的民族国家认同,这一认同,也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现代西方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而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接受的启蒙主义与进化主义现代性,把主轴放在现代,以时间的直线前进趋势,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建立在自身对宇宙和文化认识基础上的时空观,从而“改变和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史观念。”^②在以西方现代性为目标的线性发展观下,传统中国城市被作为结束的帝国时代象征,成

① 在《东籍月旦》一文中,梁启超写道,“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叙乃至谓东方民族”。——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1页。

② 李欧梵、季进:《现代性的中国面孔——从晚清到当代》,《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6期。

为新开启的资本主义时代眼中的历史遗物。现代性光辉的映照下，中国社会原有的城乡不再有分野，而是被混抹成乡土一色。费正清认为，“城乡的划分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显著特点”，^①便是基于以乡土归纳中国的论断。为向着现代性艰难生长的乡土中国构形，成为自晚清以来文学家一直致力的方向。

近些年来，晚清文学成为学界异常关注的研究区域。不少人把原因归结为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产生的巨大影响，但我们必须要看到更深层的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性的持续反思。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国学热”、历史文学及相应影视剧的如火如荼，延伸到21世纪“人文大讲堂”的开设、进入大众文化视野的史学热，都是学界开始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层面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折射。王德威的文章犹如一条引线，在文学界点燃了这一思考。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背后，隐藏的是“没有传统，何来现代”的中国现代性反思。Anderson把西方新观念进入晚清的冲击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基础，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模式是外发型，而不是内发型的，这种观点已为很多论者所接受。但正如李欧梵指出的，“西方的事物、观念的进入对晚清中国当然是一种冲击，但同时也是一种启迪，并不表示它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变化。投石入水，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皱纹，我们不能仅从西方的来源审视这些波纹”，而要从“中国文化的角度作进一步的了解”。

李欧梵的观点给了我们从小说文本出发，重审现代意义上的城乡形象的启示。以启蒙主义与进化主义理论视角解读现代性，是五四文学绘形中国的思想基点。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何城与乡在五四以来的启蒙小说里，始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并没有清晰的形态分野，这突出地表现在“镇”、“县城”这些形象在中

^①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7页。

国文学里始终徘徊在城乡分界线上，缺乏明确的定位。在纯粹的农耕村落眼里，这些地区因拥有一定的现代特征而被视为城，而在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眼里，这些地区又因一些前现代特征而被看作乡。同时，在面向西方世界的时候，整个中国依然在费力地摆脱“乡土中国”的标签。即便是在中国确立了大都市地位的上海，依然需要从与“香港”、“台北”、“巴黎”、“伦敦”、“洛杉矶”等多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演“双城记”的比附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设立比较对象，以农耕村落为“乡”发现镇与县的“城”，以镇与县为“乡”发现更大形态的“城”，再以这些更大形态的城为“乡”发现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最后再以上海为“乡”向西方城市形象眺望。这是五四以来启蒙进化论主导下的城乡发展思路。这种思路给了我们一个现代性的假象，就是把咖啡馆、西餐厅、法国香水、摇滚乐等西方文化元素，或者把摩天大楼、百货公司、工厂、烟囱、立体交叉桥等工商业元素组构的意象视为城市特征，而当我们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做成一个城市文本的时候，往往就会发现这座城市实际上是一个虚幻的能指，一个并不属于中国的符号化存在。事实上，迄今为止的多种版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里，唯一得到承认的现代城市只有上海，而现代的理由，不是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笔下的咖啡、香水与舞女，便是茅盾《子夜》中的工人运动。本书无意对此做太多的展开，因为近年来，随着晚清文学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界视野，已有学者开始从城市内部生活出发，重绘现代城市形象，如对《海上花列传》的发掘，对晚清以来鸳蝴文学生产机制等的研究，以及对穆时英等海派作家笔下上海传统一面的考察，等等。这些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传统与现代从来不是二元割裂，而是枝蔓共生的，没有任何一块土地能够以突然拔离传统的方式走入现代，与传统的盘根错节正是城乡走入现代的真实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性尽管是在西方观念冲击下发生的，但其发展的过程是中西方文化勾兑的过程，形成的结果既不是中国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

它只代表 20 世纪某一个时段的中国现状。当文学家用自己的理解记录下这一时段的中国人的生活后，担任文学批评任务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发现这个时段的文学如何反映现实生活的，以及在中国走向现代性的历程中，文学对不同时期生活的不同反映，通过比较来观察文学视角下的中国现代性发展。

之所以在这里要厘清这些，是想要对以往文学史研究城乡问题的方向做一个调整，不再以简单的文明与愚昧、现代与前现代、先进与落后这样的二元对立来划分城乡，建构城乡关系，而是把城乡作为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两种不同形态的土地展开文学考察。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城乡文学的研究中，重要的并不是分城乡与乡的界限，而是弄明白现代性的价值核心是什么。以什么为现代，在决定了城乡发展目标的同时，也返照出传统的定位。洪子诚指出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最具‘当代性’的是，出现了‘农业题材’（或‘农村题材’），‘工业题材’、‘革命历史题材’（或‘革命斗争历史题材’，或‘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历史’）等特定概念”。^①抛开别的不谈，我们单看农村题材这个概念。与新文学中的乡土、乡村题材不同，农村题材突出的，是一个“农”字，如果说“乡土、乡村”还带有故乡、家园意味的话，那么“农村”则完全是从生产形态出发的定义。同样，在城市的类型方面，马克斯·韦伯将城市分为三类：消费者购买力主要来自国内和海外商品贸易差价的商人型城市；消费能力取决于当地工厂、制造业和家庭工厂发达程度的生产型城市；主要依赖大消费者购买力的消费性城市。^②1949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要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

①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5 页。

② [德] 马克斯·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96 页。

才能巩固起来”。^①而在生产类型中,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主要目标。1951年年底,新中国迅速确立了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实施,毛泽东提出“准备以20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并把目标定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至少要达到51%”。^②《创业史》第二十四章开篇,柳青用满怀激情的文字,如此描述了1953年春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开始时的情景:“大地解冻以后,有多少基本建设工地破土了呢?有多少铁路工程进入施工阶段了呢?有多少地质勘探队出发了呢?被外国资本和国民党政府无情掠夺了多少少年的国家啊,现在终于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③

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城市仅有132个,城市人口39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7.3%。到1961年,城市数量已增加到208个,城市人口10132.4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15.4%。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20世纪50年代建成了多类型的工业城市群体,如煤炭工业城市——大同、阜新、本溪等;钢铁工业城市——鞍山、包头、武汉;有色金属工业城市——抚顺、吉林、哈尔滨、株洲、个旧、白银,以及其他类型的工业城市群体。^④这些工业城市的建设,使中国出现了一个城市化的高潮,并促使城市体系迅速由消费型向生产型转变。于是,文本中的城市形象也随之发生改变,表现为商业消费场所如咖啡馆、商场、舞厅等或消失,或作为革命对立面被批判,工业生产区域如工厂、车间、矿场等成为城市主体,高耸入云的烟囱、呼啸奔驰的火车头、庞大的瓦斯库、架在空中的煤气管等,取而代之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物。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6页。

② 安建设:《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的思考和论述》,《党的文献》2010年第2期。

③ 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431、432页。

④ 何一民:《156项工程与50年代新中国工业城市发展:1949—1957》,《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第二节 历史溯源：新中国前30年的城乡小说

发展城市工业生产需要大量青年劳动力，由于仅靠原城市人口的自然增加无法满足城市扩张和基础建设规模扩大需求，农村招工成为补充城镇人口的主要方案。毛泽东曾这样表述农民进城必要性：“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①可见，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构想里，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民转为工人，是历史进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另一方面，在国家工业化发展刚起步的阶段，根据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农村生产需要以“剪刀差”的形式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原动力，这也就决定了必须要有大批的农民立足于土地。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工矿企业在农村成规模地招收青年，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用各种宣传手段留住大量农村人才是同步进行的。城乡问题的首次出现是由教育、“三反五反”运动及第一个五年计划下实施的统购统销政策等原因引起。新中国成立初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的持续增加，造成了不少新建学校的盲目冒进，为此，1953年教育部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导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小学招生人数的突然下降。“由于被整顿的大多数是解放后在农村新建的中学，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尤其是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的问题就比城市中更为严重”，^②于是，这些毕业生就成批地、自发地涌入城市谋求出路。另外，“三反五反”运动造成大量城镇人员失业，农村劳动力因此涌向城市，再加上1952年、1954年两年自然灾害严重，而国家为了保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26页。

②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护工业生产采取的统购统销政策，导致农民被过度征购，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高于农村，也促发了大批农民进城，诸多原因共同作用下造成的大批农民自发进城，让已经被就业压力和粮食紧缺问题压得喘不上气来的城市无法承受，于是，动员他们回乡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政务院、内务部分别于1953年、1954年连续发出《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和《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劝止农民盲目进城。

由于在这些自发进城的农民中，农村中小学毕业生，也就是回乡知青占了很大比例，故动员这批人回乡务农成为政府首先要解决的任务。1954年3月2日，权威党报《人民日报》转载了《大众日报》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一文，为全国知识青年树立了第一个回乡知青先进典型徐建春。随后，文学创作也迅速跟进。同年，《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马烽的短篇小说《韩梅梅》，塑造了韩梅梅这样一位主动回乡养猪的农村知青模范形象。小说情节简单明了，用主人公韩梅梅写给老师的四封信，讲述了高小毕业生韩梅梅没上中学，不顾父亲的怒骂、村人的嘲笑，主动回农村养猪，用科学养猪的方法成功解决了养猪难题，成为了生产模范的故事。与韩梅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同村同学张伟，他既不愿意参加农业生产，觉得“丢不起这个人”，跑到城市工厂做工，又吃不了苦逃回家。《韩梅梅》的写作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告诉读者安心农业生产，不要贪图个人物质享受。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954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专门出版了这篇短篇小说，1955年5月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再版，前后共发行超过三十万册。1957年，党中央发出了“向韩梅梅学习，争做第一代有文化新式农民”，将小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同样有很大影响力的，还有康濯的《春种秋收》。比起《韩梅梅》的单线条写作，《春种秋收》加入了爱情线索，因此情节更为错落，小说艺术性也更强一些。小说主人公刘玉翠同样是高小毕业，

却不愿在农村劳动，一门心思打扮自己，想嫁到城市去，在她看来，只有城市里的妇女才有“说不尽的远大的前途。而且，城市是电灯电话，高楼大厦，花衬衫，洋袜子，妇女的头发听说都是一髻一髻的”，相比之下，自己住的小山沟，农民翻身了，“可也翻不出夹着石头的二亩硬土！村里连个农业社都没办，想闹个俱乐部也闹不起来。”^①她找了好几个城市对象，都不太理想，自己看中了县团委副书记，人家却嫌她不安心得在农村。在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技术员周昌林共同耕种了一年多后，两人互生情愫，刘玉翠也慢慢认识到了自己的思想错误，拒绝了县百货公司大干部，和周昌林结了婚。康濯巧妙地用小说女主人公刘玉翠爱情观的转变故事，展开对农村读者城乡观、生产价值观的教育，因而也收到了相当不错的社会效果。

比起那些大字不识的农民，读过书的农村青年与城市的距离更近，对农村的拒斥感更强，进城的渴望也就更强。周立波在《王秉源和韩文恭》一文中曾这样描写回乡知青对农村的厌恶之情：“在农村里，文化生活更是缺乏的，我的生活与农民是没有区别的，长期被封禁在文化落后，毫无物质文明的深山村子里，很难看到一次报纸，无法向外界了解新鲜事物，祖国在各方面都在飞跃前进，在我，却是聋子、瞎子。客观环境使我变成了自私、落后、狭隘、保守的一个人了。”^②我们没有办法指责这些农村知识青年对故土的拒斥，因为他们接受的现代教育就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不管城市文明的商业化、消费主义被意识形态压抑到什么程度，其现代文明地标的特性是20世纪以来不曾改变过的，与农村之间物质文化生活的显在差距也始终存在；并且，从情感上来说，青少年时期在城市度过的读书生活，也往往容易让这些农村青年对城市产生一定程度的依恋。所有这些，都决定了绝大多数回乡知青对城市的认同感远远大于农村。事实上，正如定宜庄在《中国知青史》里讲到的，当这些接受

① 康濯：《春种秋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11—312页。

② 周立波：《王秉源和韩文恭》，《中国青年》1955年第20期。